

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进路

——兼论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与学术性

张志洲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中国学界提出了创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命题。创建中国学派的要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问题意识”,二是反映中国之国际观或国际政治哲学。中国学派的基本进路就是“既要研究问题,又要思考主义”。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和学术性之间存在复杂的辩证关系。只要整个学界有一种自然的分工,研究的是真问题,或构建的是具有知识增量的理论,中国学派就将在健康的研究生态环境中成长起来。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学派 政策性 学术性

国际问题研究大致有两个指向:一是政策性研究,二是学术理论性研究。这两者不相冲突,但学者们的研究却往往各有侧重。严格说来,国际问题研究与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研究之间有所差别,前者的重点在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后者的重点在于学术理论性的探讨。但从根本上说,如果不是基于深入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缺乏国际关系理论的抽象和学理认知,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往往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今天的中国学界提出了创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课题,这当然首先是指创建中国自己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术理论,因为没有理论就没有学派,但其落脚点必然在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在崛起进程中所遇到的特殊性问题的研究。换言之,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

* 张志洲: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100089)

基本进路,在于立足于中国崛起中所遇到的国际问题的特殊性,将理论探讨与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相结合,既注重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效果,又注重学术理论的抽象与总结。

一、问题的提出:为何要创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

与二三十年前相比,今天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或国际问题研究,在学科建制的完善性、研究力量的壮大和研究水平的提升、所出版著作的数量和质量、学术规范化的自觉及本领域的学者对政府决策咨询参与度等方面,无疑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不过,一种看似发展和繁荣的景象,却掩盖不住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尴尬,这表现在诸多方面:第一,在西方理论的强势入侵下失去了“中国”主体性。在过去十多年间,我们在如饥似渴地学习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理论的同时,误将它们等同于科学和先进的化身,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几乎成了西方理论的跑马场和殖民地,许多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作也不过是对西方理论的注释性解读。第二,国际关系的思想和理论的原创性严重不足。这与第一点相关,大量的所谓理论探讨的文章,落到西方理论的窠臼里不能自拔,误把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和国际观念特殊性、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的理论当作普遍规律,对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反复咀嚼,螺蛳壳里做道场,空对空,远离现实经验,甚至违背常识。第三,中国学界充斥着低水平重复研究。大量的研究具体国际问题的论文,或观念先行,套用西方理论而不顾事实;或浅尝辄止,不深不细;或隔靴搔痒,言不及义,既缺乏政策的敏感性,也缺乏思想见解的深刻性,最后的结论更是毫无新意,或是废话一堆。体现第二点与第三点特征的文章比比皆是,占据着学术期刊的大幅版面。第四,缺乏学术自觉性。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些“从业人员”,发表文章不是为了探明问题或做出学术贡献,而只是为了完成学业或职称评定的功利性目的。第五,缺乏中国问题意识和学科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总体上尚无法解答中国崛起进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国际难题,不能解释或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崛起进程中所遇到问题的特殊性,无法从历史经验和学术逻辑上强有力地回应来自西方的挑战性论题,如“中国威胁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等,反而通常是被美国或西方的论题牵着鼻子走。

由于以上的种种现象和事实,使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无法担负起为中国崛起创造国际关系理论和解答具体国际问题的使命。因此,最近几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了很多反思和自我批评的声音,并逐渐成为了一种主流呼声。在这种反思和自我批评兴起的背景下,创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逐渐成为中国学界追求的目标。这一方面固然在于中国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崛起这一进程对于国际关系理论需求、问题解答和智力支持的召唤,但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学界自身主体性意识的普

遍觉醒,而既有的成就则为中国学派的创建提供了一定的学科基础。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求自己是一个拥有文化主体性的思想和学术理论的大国,是一个对重要的国际问题拥有知识和学术话语权的大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并正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崛起的大国,如果在国际关系理论见解上失语,那么就容易受别人理论的影响甚至思想上的奴役。从这一点来说,创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一种思想上的独立和解放运动。创建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正是反映了这样的种种要求和愿望。

二、基本进路:既要研究问题,又要思考主义

对于如何创建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中国学界已经有了一些开创性的讨论。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以梁守德和何方为代表的一些老一辈学者,就明确地提出并论证了建设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的命题,在探讨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近些年来,中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多、更深入了,在此试举几种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如王军从主体性视角探讨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问题,并重点考察了理论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漂移,从而试图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及其发展提供一种新视角;^①鲁鹏则概括并分析了目前国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主要存在的四种途径:一是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范本,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对科学研究的决定性作用;二是以英国学派为目标寻求非美国化的道路;三是以西方理论发展过程为范本,以西方科学发展经验指导学科建设;四是以中国外交实践与理论为基础,结合政治文化传统来创立自己的理论。^②而秦亚青教授提出,理论核心问题的建构是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生成的必要条件,中国学派的核心就是崛起的中国如何和平地融入世界。^③与此同时,学界的研究风尚也在悄然发生着“向内转”的变化,即从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思想传统中,发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思想历史资源与世界观念依据的研究正在不断增多。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叶自成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间“外交”思想的探索,^④阎学通任所长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有系统地先秦诸子或其主要文献中国际关系思想的梳理和归纳,以及哲学界的赵汀阳从“天下”角度对世界政治制度的探讨。^⑤笔者也在这方面做了些研究,就崛起背景下如何发掘传统思想文化资源构建中国外交哲学,并以对“势”概念的疏理为例阐述了构建中国自己的

① 王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一种主体性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

② 鲁鹏:《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四种途径的分析与评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

③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④ 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⑤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政治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核心概念和话语体系的学科建设途径。^①

以上所述不同视角、不同向度的探讨,都对于创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有着重要的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根本上说,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要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问题意识”,二是反映中国之国际观或国际政治哲学。先就“中国问题意识”来说,这里的“中国问题”不是指中国的内政问题,而是指中国所遇到的国际问题。众所周知,理论的创造是从问题开始的,就如牛顿是从“苹果为什么落地”这一问题出发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在社会科学中或更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中,“问题意识”也同样是创造理论或发现规律的起点。秦亚青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一文中提出,建构国际关系中国学派首先必须找到中国的理论“核心问题”,道理正在于此。寻找理论核心问题的意识,实际上就是构建具有统摄意义的“中国问题意识”。当然,“中国问题意识”还包含更多的含义,不仅包括崛起的中国如何和平融入世界这样的核心问题,而且还包括中国在崛起进程中所遇到的其他特殊性问题,如中国需要确定什么样海洋战略,如何处理好从海外获得能源和矿物资源与扶持一些贫穷国家发展,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生态风险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等问题。虽然大多“国际问题”是国际社会所共同应对的,但不管从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历史来看,还是从提出“依附论”的拉美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处境来看,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创建,之所以能形成自身的特色和学说流派,恰恰在于它能从其自身所遇到的具有特殊性的、必须从理论上进行根本性解答的国际问题开始的,也就是它们都具有很强的“自我问题意识”。国际关系中国学派当然也只有在敏锐的“中国问题意识”指引下,才可能最终形成。

不过,只有“中国问题意识”是不够的。问题虽然是研究的起点和理论的起点,但并不决定理论本身的内容与性质。进一步说,即使有明确的“中国问题意识”,找到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问题,也不能保证能建构起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如果用美国学者的主流观点和思路来观察和思考问题,那么由此所构建起来的理论将更像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支,而不是中国学派。因此,要创建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除了“中国问题意识”之外,更需要在理论构建中反映中国的国际观或国际政治哲学。所谓不同的国际关系学派,最关键的区别不在于研究的问题不同,而在于最基本的国际伦理观或国际政治哲学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同样以“霸权护持”为核心问题,美国的学界却产生了多种国际关系学派的根本性原因。

其实,在充满矛盾和差异的民族国家体制之下,国际关系理论首先不能回避国际社会的正义问题和和谐性追求,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理论

^① 张志洲:《构建中国自己的外交哲学刍议》,《国际观察》2007年第1期;《在崛起背景下构建中国自己的外交哲学》,《国际论坛》2007年第1期;《国际政治中的“势”》,《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

首先应该提供一种世界观,这是国际关系的价值和伦理问题,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哲学观问题。^①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本身就表明了其基本的国际政治哲学。英国学派更是有明确的价值伦理关怀,对国际正义的关心、理性主义的道德传统、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构成了它的明显的理论特征。其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即国际关系研究“根本不存在价值无涉之类的东西”,自称研究不带价值判断是荒唐的、徒劳的,政治领域的学术研究必须把道义问题和政治问题均视为题中应有之义。他甚至还认为,20世纪末“后实证主义革命”的唯一意义,是重新发现了道德问题,重新认识到国际关系既关乎手段也关乎目的。^② 由此对照,国际关系中国学派也必须拥有自己的、体现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国际观和国际政治哲学,这将是 中国学派的灵魂所在。

概括而言,创建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必须把握以上两个方面的要义,既要有“中国问题意识”,又要在理论构建和具体的问题研究中体现中国的国际观和国际政治哲学。通俗地说,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基本进路,就是“既要研究问题,又要思考主义”,二者不可偏废。

三、国际问题研究的落脚点:政策性还是学术性?

不管国际关系中国学派将由什么样的国际观或国际政治哲学来统摄,最终都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之中。理论之正确与否,或政治哲学观之是否可行,都必须经由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政府政策来检验的。对于学者们来说,不同的喜好或研究侧重,往往被归结为研究落脚点的不同:是政策性研究,以影响政策为目的;或是学术性研究,以探讨学术理论为目的。

通常,对世界观或政治哲学层面的论题的探讨,将具体的国际问题作为个案来研究,目的是为了达到理论上的抽象或总结出国际政治的科学规律,那么这样的研究,就容易指向学术性。而对于国家外交部门或决策机构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寻求出对策方案,则往往指向政策性研究。由于一个国家所面对的具体国际问题变动不居地变换,这样的研究若不是抱有影响政策的目标,可能很快就会失去价值。虽然对学者个人来说,即使研究的都是很现实的具体国际问题,并能提出很好的政策建议,其对政策的影响也只能是偶然的,但是研究政策性问题或寻求研究的政策性影响,却是学者群体的一种使命。

国际问题研究中政策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实际上相当复杂。为了澄清可能出现

① 张志洲:《西方话语体系下的迷误》,《东方早报》2005年8月12日,A15版。

② 转引自石斌:《权力·秩序·正义:“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伦理取向》,《欧洲研究》2005年第4期。

的一些片面观点,这里有几个方面需要说明:其一,由于好的政策建议往往产生积极的国际影响,而坏的政策建议却可能给国家带来灾难,而政策建议往往又是针对具体的国际问题而提出的,所以,为了避免“坏的建议带来坏的政策”,就必须对具体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奉行“价值中立”的基本研究原则。其二,构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或理论话语,并非只是为了学术性,而完全可能是为了某种政策性目标,如中国“和平崛起”的话语被许多人当作学术性课题研究,而事实上恰恰是应对“中国威胁论”这样政策性意图的产物。其三,国际关系学术理论看似“无用”,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决没有政策性研究那样直接,学术研究者甚至可能根本不关心政策,但是政策却可能深受某种理论的影响。如地缘政治理论、多米诺骨牌理论对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影响,就很显然。其四,如果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被广泛地接受,为国家增加了国际话语权或文化思想领域的“软实力”,那么它就自然产生了政策性效果。总之,学者们虽然有自己研究目标的侧重性,或落脚于政策性,或落脚于学理性,但所产生的影响的结果却可能完全相反。概言之,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和学术性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

如果说“中国问题意识”与中国的国际观或国际政治哲学,是创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两个轮子,那么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就是使轮子运转起来的基本动力。不管一个学者研究的落脚点在于政策性影响还是学术性建设,都是“中国学派”所需要的。只要整个学界有一种自然的分工,只要研究的是真问题,构建的是具有知识增量的理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就将在健康的研究生态环境中成长起来。